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披露与社会风险应对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的研究

本期作者：赵晶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主编：杨光斌
总第七期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披露与社会风险应对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的研究

本期作者：赵晶

主编：杨光斌

总第七期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披露与社会风险应对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的研究

赵晶

一、引言.....1

二、理论背景和假设提出.....8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结果.....16

四、结论与启示.....19

五、参考文献.....26

阅读提示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是中国跨国公司一种应对东道国社会风险的战略手段。与以往直接衡量社会风险的研究不同，本文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研究背景，提出了鉴别社会风险影响的新方法。虽然中国跨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使它们免受来自东道国政府的政治风险，但仍面临着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风险。通过双重差分法分析，本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跨国公司比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跨国公司更可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而且这种影响对国有跨国公司和自然资源行业的跨国公司更为明显。具体而言：

第一，本研究为国际商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研究做了补充。以往研究往往将社会政治风险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将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区分开来分析。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对跨国公司绩效的影响，而忽略了跨国公司如何应对此类风险。

第二，以往关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通常将其合法性挑战归因于其本国的

制度缺失。然而，本研究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参与的驱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中国跨国公司响应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成员国的投资行为，可以被视为利用企业政治活动（CPA）来管理政治风险的一种方式，从而降低了它们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但可能使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风险变得更加突出。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披露与社会风险应对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的研究

作　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关键字：技术变迁、权力转移、军备竞赛、政企合作、世界政治

赵晶

一、引言

跨国公司在其东道国通常面临两种非市场风险，即由东道国政府施加的政治风险和由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引发的社会风险（Franks *et al.*, 2014; Simon, 1984）。东道国存在此类非市场风险反映了跨国公司普遍面临的合法性挑战，如难以被当地政府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接受（Dowling & Pfeffer, 1975）。为了克服非市场风险，跨国公司可以开展企业政治活动（CPA）和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来获得东道国市场的合法性（Den Hond, Rehbein, de Bakker, & Lankveld, 2014; Rodriguez, Siegel, Hillman, & Eden, 2006; Sun, Doh,

Rajwani, & Seigel, 2021）。虽然大量的国际商务研究致力于了解跨国公司如何应对和处理政治风险，例如与东道国政府建立关系、与当地官员建立联系或发展政治能力（Luo, 2006; Li, Meyer, Zhang, & Ding, 2018; Rodriguez *et al*., 2006），但社会风险及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在学术界受到的关注有限。现有国际商务文献对社会风险关注不足，主要是因为社会政治风险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现有研究假设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高度相关，并且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类似的非市场策略来处理（Ho, Oh, & Shapiro, 2023），即可以同时减少政治和社会风险以获得合法性。然而，这两种非市场风险实际上可能并不一致，获得政治合法性有时可能会以牺牲社会合法性为代价。因此，国际商务学者需要更多关注来区分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并探讨社会风险的影响以及跨国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国际商务领域中关于社会风险的少数开创性研究分析了东道国社会风险的前因及其对跨国公司绩效的影响（Dorobantu, Henisz, & Nartey, 2017）。例如，研究表明某些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可以针对跨国公司发起重大活动（Nartey, Henisz, & Dorobantu, 2018），并且此类活动对跨国公司的估

值产生了实质性的不利影响（Henisz, Dorobantu, & Nartey, 2014）。然而，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了解跨国公司如何应对和回应东道国的社会风险（Franks *et al*., 2014），尤其是对于像来自中国这样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EMNEs，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因为它们通常缺乏国际化经验（Lu, Liu, Wright, & Filatotchev, 2014），并且经常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Cuervo-Cazurra & Ramamurti, 2014）。在本研究中，本文旨在研究东道国的社会风险对中国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倾向于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作为一种战略工具，以应对东道国的社会风险，因为社会责任披露可以向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传达重点企业对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承诺，并发出信号表明企业的投资将符合全球规范（Cormier, Magnan, & Van Velthoven, 2005; Ho *et al*.,2023; Marano, Tashman, & Kostova, 2017）。

为了实证检验本文的预测，本文利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作为独特的研究背景。中国的 BRI 在 IB 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并受到越来越多 IB 学者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具有经济和政

治的双重影响，还同时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和成员国双方（Lewin & Witt, 2022; Li, Van Assche, Li, & Qian, 2022a; Witt, 2019）。BRI于201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旨在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进经济、外交和政治目标（Blanchard & Flint, 2017; Lewin & Witt, 2022）。通过BRI合作协议，成员国政府有义务为中国跨国公司创造更大的市场，并保护其在当地市场的投资。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BRI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得到缓解，而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风险仍然很大（Buckley, 2020; Zhang, Alon, & Lattemann, 2018）。因此，BRI背景非常适合研究社会风险对中国跨国公司非市场战略的影响。

为了鉴别出社会风险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DD）研究设计，并使用了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将在整个观察窗口内将仅投资于“一带一路”成员国的中国跨国公司归类为受处理组，将整个窗口内仅投资于非“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归类为对照组。最终样本由215家中国跨国公司组成，其中84家为受处理企业，

其余131家为对照企业。研究发现，与仅投资于非“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跨国公司相比，在“一带一路”倡议颁布后，仅投资于“一带一路”成员国的中国跨国公司显著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并丰富了报告中披露的内容，以此作为对这些国家显著社会风险的回应。此外，这种影响对于国有跨国公司和自然资源领域的跨国公司更为显著。

本文研究具有以下研究贡献。第一，本研究为国际商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研究做了补充。以往研究往往将社会政治风险作为一个整体（e.g., Ho *et al*., 2023），而不是将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区分开来分析。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对跨国公司绩效的影响（Dorobantu *et al*., 2017; Henisz *et al*., 2014），而忽略了跨国公司如何应对此类风险（e.g., Hofman, Li, Sun, & Sun, 2019; Shapiro, Vecino, & Li, 2018b）。因此，本研究首先通过区分东道国市场中的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为以往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利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研究背景，本文强调尽管通过双边协议可以保护外国直接投资免受政治风险的影响，但它仍然可能面临东道国当

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带来的重大社会风险（Shapiro *et al*., 2018b）。此外，本文还揭示了跨国公司可以采取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等行动来减轻东道国的社会风险，从而有助于加深关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如何应对社会风险的现有理解（Campbell, Eden, & Miller, 2012; Marano *et al*., 2017; Scherer & Palazzo, 2007）。

第二，以往关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通常将其合法性挑战归因于其本国的制度缺失（e.g., Marano *et al*., 2017），然而，本研究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参与的驱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揭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因官方双边合作协议而产生的政治合法性可能会导致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施加的社会合法性挑战增加。因此，东道国市场中的这种社会风险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参与企业社会责任以获得社会合法性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第三，本研究还加深了对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之间关系以及企业政治活动（CPA）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之间关系的理解。现有研究主要分别考察了企业政治活动或社会责任对缓解东道国非市场风险的影响（e.g., Albino-Pimentel,

Dussauge, & Shaver, 2018; Marano *et al*., 2017）。最近的一些研究将学术注意力转向了企业政治活动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see for instance, Sun, Doh, Rajwani, & Seigel, 2021; Li, Shapiro, Peng, & Ufimtseva, 2022b），至于企业政治活动在管理政治风险方面的作用，既有研究已经确定了典型应对方案，如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联系（Albino-Pimentel *et al*., 2018）或投资于与母国外交关系较好的东道国（Li *et al*., 2018; Sun *et al*., 2021）。本研究表明，中国跨国公司响应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成员国的投资行为，可以被视为利用企业政治活动（CPA）来管理政治风险的一种方式，从而降低了它们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但可能使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风险变得更加突出。因此，本文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应该区分两种非市场风险（即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并制定不同的策略。这也补充了近期国际商务文献中关于企业政治活动（CPA）和企业社会责任（CSR）之间互补性的持续讨论（Li *et al*., 2022b; Mellahi, Frynas, Sun, & Siegel, 2016; Sun *et al*., 2021）。

二、理论背景和假设提出

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在东道国面临两种非市场风险，即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Simon, 1984）。这两种风险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合法性挑战（Kostova & Zaheer, 1999），即不被东道国的政府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所接受和认可（Dowling & Pfeffer, 1975; Rodriguez *et al.*, 2006）。学者们认为，跨国公司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不仅需要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政治或法律许可，还需要获得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许可”，尤其是当它们瞄准自然资源或基础设施行业时（Ho *et al.*, 2023; Demuijnck & Fasterling, 2016; Prno & Slocombe, 2012; Shapiro, Hobdari, & Oh, 2018a）。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非市场风险的应对策略受到了广泛的学术关注。然而，现有的关于政治和社会风险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东道国市场中政治风险的影响（e.g., Brewer, 1993; Kobrin, 1979），以及跨国公司的应对策略（Luo, 2006）。人们已经认识到，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企业政治活动、培养政治能力来缓解政治风险（García-Canal & Guillén, 2008; Rodriguez *et al.*,

2006）。最近的一些研究将学术注意力转向了东道国市场的社会风险上（e.g., Franks *et al*., 2014），并记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风险，如公众对外国投资者的暴力行为（Oh & Oetzel, 2017），社区成员或非政府组织的抗议（Rodriguez *et al*., 2006），当地客户和供应商的抵制和制裁（Klein, Smith, & John, 2004），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刻板印象和歧视（Cui & Jiang, 2012）。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中的社会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绩效可以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Henisz *et al*., 2014; Oh, Shapiro, Ho, & Shin., 2020）。然而，跨国公司如何能够主动应对和处理东道国市场中的社会风险？这一问题在文献中仍未得到充分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可能并非高度相关，而且这两种非市场风险也难以通过同一个非市场策略来应对。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不一定能增强社会合法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克服政治风险的公司政治行动甚至可能会增加社会风险（Sun, Mellahi, & Wright, 2012）。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社会风险的影响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应对需要更多的学术关注。为了填补该研究缺口，本研究从社会责任披露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跨国公司应对东道

国社会风险的策略。本文提出，中国跨国公司倾向于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作为一种应对东道国社会风险的战略工具，以获得当地的社会合法性。

（一）社会风险和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披露

近年来，一些国家之间签署了政治协议，以促进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Albino-Pimentel *et al*., 2018）。这些协议通常被视为带有政治动机（Shapiro *et al*., 2018b）。签署协议的双方政府有义务保护外国投资者免受政治风险，如潜在干预和资产或利润的征收（Kerner, 2009; Stevens, Xie, & Peng, 2016）。然而，签署此类协议也可能被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视为将本属于本地投资者的投资机会让给了外国投资者，因此这份协议可能被视为对东道国主权的干涉（Neumayer & Spess, 2005）。这种认知可能导致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对跨国公司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当跨国公司在与本国签署政治协议的东道国投资时，它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免受政治风险，但由于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抵制行动而仍然面临社会风险。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甚至可能面临更高的社会风险，因为当地的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往往怀疑这些

外国投资具有政治目的，甚至存在一些隐藏的议程（Li, Newenham-Kahindi, Shapiro, & Chen, 2013; Shapiro *et al.*, 2018b）。

类似地，中国跨国公司投资于“一带一路”成员国，可以免除政治风险，但在当地市场仍然面临较高社会风险。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援助、贷款、贸易、投资和投资激励等多种形式（Buckley, 2020），被视为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推进其经济、外交、地缘政治和其他战略目标的工具（Blanchard & Flint, 2017; Lewin & Witt, 2022）。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可能被视为受政治动机驱动的，这可能会引起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担忧。这种舆论兴起可能导致中国跨国公司在获得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合法性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Li, Liu, & Qian, 2019）。

其次，研究曾指出许多中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投资不足（Du & Vieira，2012），甚至有报道称一些中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不负责任地运营，引发了当地对环境污染、人权问题和其他不当行为的担忧（Armony & Strauss, 2012）。由于这些报道，“一带一路”倡议在部分当地非政府组织利益

相关者中受到质疑，他们认为中国投资者旨在从东道国获取资源，并在东道国制造债务陷阱（Arduino & Gong, 2018）。这些担忧和问题往往会引发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敌对态度和抵制行动。

在面对突出的社会风险时，中国跨国公司有动机在东道国市场寻求“社会许可”。文献中普遍认为，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有助于获得社会许可（Ho *et al*., 2023）。因此，本文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可以作为中国跨国公司获得当地利益相关者接受和信任的战略合法化工具，从而应对东道国市场的社会风险。这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如产品质量和工作场所安全，从而减少了信息不对称（Young & Marais, 2012），补充了中国跨国公司的刻板印象之外的形象。此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以表明中国跨国公司与全球规范的一致性，并帮助他们获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积极评价。例如，披露他们为保护当地环境和创造公共利益所做的努力，可以在当地利益相关者心中树立一个社会责任的形象。

基于上述论点，本文提出， 在“一带一路”

倡议颁布后，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跨国公司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可能性，要高于投资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同类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可能性。

（二）边界条件分析

因为不同的所有权或行业特征可能导致跨国公司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风险，不同类型的中国跨国公司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社会责任披露增加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因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中国跨国公司的所有权类型和业务重点的边界条件，以验证上述主要假设。

国有股份的调节作用。国有企业由政府或其机构所有，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印记（Buckley, Yu, Liu, Munjal, & Tao, 2016）。相应地，本文进一步提出，当国有跨国公司投资于“一带一路”成员国时，它们在当地市场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社会风险（Li, Xia, & Lin, 2017; Meyer, Ding, Li, & Zhang, 2014; Shapiro *et al.*, 2018b），因此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披露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首先，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来自本国政府的资源，但在对外投资方面承担的国家任务也比非

国有企业更多（Li *et al*., 2017）。因此，中国国有跨国公司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更可能被外国利益相关者描述为是从“一带一路”国家获取资源，甚至威胁到东道国的国家安全。“一带一路”成员国的社会团体往往高度关注这些公司投资活动背后的任何政治动机。相应地，国有跨国公司更有可能面临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质疑。此外，中国国有跨国公司也曾因缺乏透明度而受到批评（Zhang *et al*., 2018），从而增加了它们在“一带一路”成员国的社会风险。其次，由于其具有的政治印记（Buckley *et al*., 2016），中国国有跨国公司很容易被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贴上相关刻板印象的标签，给东道国投资带来了合法性挑战（Kostova & Zaheer, 1999），特别是考虑到一些中国跨国公司过去被指责在投资中存在不负责任的行为（Gong, 2018）。因此，为了应对这种加剧的社会风险，中国国有跨国公司可能更渴望在东道国追求社会合法性。

基于上述论点，本文认为中国国有跨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面临更大的社会风险，更可能将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作为在东道国市场获得社会合法性的策略。

自然资源行业的调节作用。现有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产业往往吸引大量在双边经济协议下进行的国际投资（Broadman, 2007; Colen, Persyn, & Guariso, 2016; Wapmuk, 2012），并且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自然资源行业非常广泛（Li *et al.*, 2013; Shapiro *et al.*, 2018b）。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中国跨国公司行业属性的影响，并提出在“一带一路”成员国投资中属于自然资源重点行业的中国跨国公司将在东道国面临更大的社会风险。

首先，自然资源产业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Colen *et al.*, 2016; Hilson, 2012）。在这些领域的外国投资背后的任何政治动机都可能引起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极大担忧（Shapiro *et al.*, 2018a）。由于“一带一路”倡议被一些外国利益相关者视为中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工具（Blanchard & Flint, 2017），因此相关企业投资的动机经常受到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质疑（Arduino & Gong, 2018），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自然资源领域的中国跨国公司更有可能被视为受政治驱动的。相应地，这些企业可能会面临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更大的

社会阻力，并且在获取“社会许可”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其次，自然资源产业（如石油开采和煤炭开采）的商业活动通常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较大（Hilson, 2012），并且通常与当地社区的生活较为紧密（Shapiro *et al*., 2018a），从而可能引起东道国当地民众对该类投资更大的担忧（Ho *et al*., 2023）。因此，自然资源行业的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Shapiro *et al*., 2018a）。对于中国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特别是一些公司在其先前的国际投资中曾被报道漠视环境和社会责任（Gonzalez-Vicente, 2012）。基于矿业企业些近期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为其在东道国市场带来了社会许可（Ho *et al*., 2023）。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预期，专注于自然资源行业的中国跨国公司在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后往往会有更强烈的动机披露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以应对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社会风险增加。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结果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旨在提出新方法来捕捉社会风险对跨

国公司应对策略的影响，以补充既有文献对社会风险的衡量以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评估。具体地，本文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研究背景。在“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下，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带一路”成员国当地政府的政治风险保护，但在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中仍面临巨大的社会风险（Buckley, 2020; Zhang *et al*., 2018）。因此，通过将投资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跨国公司与投资于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同类企业进行比较，本文可以相对干净地分离出社会风险的影响，以弥补其他情境难以完成该分离的不足。

本文主要数据来自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子库，该数据库整理了中国上市公司在所有行业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本文将仅投资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公司确定为“处理组”，将仅投资于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公司确定为“对照组”。此外，为了将特定东道国的社会风险与本文关注的处理事件（即“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区分开来，本文进一步将样本限制为在处理事件前后均在同一东道国投资的企业。由于中国政府于2015

年3月发布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份官方文件，且中美贸易战于2019年开始，可能会影响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因此，本文将2015年设定为处理事件的启动年，观察窗口为2011年至2018年。最终样本由215家中国跨国公司组成，其中84家为“一带一路”企业，其余131家为“非一带一路”企业，总计1269个观测值。

（二）假设检验结果

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相比于仅在非BRI国家投资的跨国公司，投资于BRI国家的中国跨国公司更可能提高CSR披露。同时，本文参照Hoetker（2007）的方法计算每个观测值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投资于BRI国家的中国跨国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增加了12.91%。上述结果说明了，当投资地区政治风险降低但社会风险凸显时，跨国公司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以应对该社会风险。

同时，调节效应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投资于BRI国家的中国国有跨国公司更可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且投资于BRI国

家资源行业时可能性更大。本文还采取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应用因变量替换分析、替代样本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更换回归模型（Logit 回归）等检验方法后，相关结果均再次证明上述研究结论。

四、结论与启示

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研究背景，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的方法，结果表明：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相比投资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披露可能性显著增加。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中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政治风险，但它们在这些国家面临的社会风险仍然存在，本文研究结果指出中国跨国公司会采取 CSR 披露作为对东道国市场社会风险的战略应对措施。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跨国公司和自然资源行业的跨国公司比非国有同行业或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披露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在东道国通常面临更高社会风险。

（一）理论贡献

本研究有以下理论贡献。第一，本研究为国际商务领域中社会风险研究做出了贡献。既有研究主要关注非市场风险对跨国公司财务业绩的不利影响（Dorobantu *et al*., 2017; Henisz *et al*., 2014），但缺乏对跨国公司应对措施或相关反应的深入讨论。此外，现有研究往往将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e.g., Ho *et al*., 2023），而不是将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区分开来。本文认为，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并非完全一致，并揭示了中国跨国公司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如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作为非市场策略来缓解东道国市场的社会风险，从而发展了关于社会风险的现有文献。此外，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来鉴别社会风险的影响，为研究社会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本研究为CSR研究做出了贡献，也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CSR的驱动因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以往关于新兴市场国家CSR的研究通常考虑其国内制度缺失的影响（e.g., Marano *et al.*, 2017）或制度距离的作用（Marano & Kostova, 2016）。本文则关注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合法性挑战，并表明这种社会风险可

能是推动跨国公司CSR的重要驱动力，发展了关于新兴市场国家CSR的现有文献。

第三，当前的研究也为近期国际商业文献中关于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之间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企业政治行动（CPA）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做出了贡献。虽然近期的一些研究开始探讨CPA和CSR之间的关系（Sun *et al*., 2021; Li *et al*., 2022b），但大多数研究分别考察了CPA和CSR对缓解东道国非市场风险的影响（Albino-Pimentel *et al*., 2018; Marano *et al*., 2017）。本研究表明，中国跨国公司响应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成员国的投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企业政治活动（CPA），从而降低了它们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但可能使来自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风险变得更加突出。本研究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可能会以牺牲社会合法性为代价。尽管CPA有助于跨国公司获得政治合法性，但它可能会在东道国市场意外引发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CSR可以在获得社会合法性方面发挥战略性作用（Sun *et al*., 2012）。因此，本文研究揭示了CPA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互补性，进一步拓展了有关CPA与

CSR关系的讨论。

（二）实践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对企业外直接投资也具有实践意义。尽管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跨国公司免受政治风险，但它们并不能保护跨国公司免受当地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社会风险。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为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事件等日益严峻的可持续性挑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已成为衡量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尺。本研究不仅揭示了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社会风险的现实，更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为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中，必须秉持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并重的原则，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随着全球可持续性问题的不断加剧，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跨国企业在海外投

资时，即便有国家间的合作协议作为支撑，也不能忽视社会风险的存在。因此，中国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以赢得东道国的社会认可，提高海外投资的效益。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还能为企业在当地市场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研究还建议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制定政治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例如为全球监管做出贡献和提供公共产品（Scherer & Palazzo, 2011），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改善当地制度环境，从而缓解东道国市场中的非市场风险。

第二，为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加大力度激励相关企业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决策体系，积极倡导负责任投资原则。具体而言，国资委、证监会、股票交易所等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新时代背景下各类型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和路径，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可持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商务部、外交部等相关部门应发布各国投资指引，详细阐述各国重要的社会责任议题，为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指

引。

第三，政府和社会各界还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和评价，推动其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包括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审核和评估，以及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等。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促使企业更加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给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方向。首先，本文没有考虑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特别是，非政府利益相关者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和程度可能会影响社会风险的大小。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东道国政府与非政府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其次，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了本文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由于缺乏外国子公司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本文不得不使用公司层面的社会责任信息，从而导致回归中伪R方相对较小，而东道国社会风险可能只解释

跨国公司的公司层面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披露决策的部分方差。本文鼓励未来研究收集有关中国跨国公司针对不同东道国的更精细具体的社会责任活动数据，采用新方法（如对当地报纸的文本分析）来研究中国跨国公司如何根据不同东道国和各种非市场风险定制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商务学者的关注（e.g., Lewin & Witt, 2022; Li *et al*., 2022a），本文鼓励未来研究可以更仔细地审视中国跨国公司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成效。

五、参考文献

Albino-Pimentel, J., Dussauge, P., & Shaver, J. M. 2018. Firm non-market capabilities and the effect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9(10): 2770–2793.

Arduino, A., & Gong, X. 2018.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n A. Arduino, & X. Gong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3–14. Singapore: Palgrave.

Armony, A. C., & Strauss, J. C. 2012. From going out (*zou chuqu*) to arriving in (*desembarco*): Constructing a new field of inquiry in China-Latin America intera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209: 1–17.

Blanchard, J. M. F., & Flint, C. 2017. The geopolitics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Geopolitics***, 22(2): 223–245.

Brewer, T. L. 1993. Government policies,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4(1): 101–120.

Broadman, H. G. 2007. ***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Buckley, P. J. 2020. Book review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nging the Rule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1: 279–281.

Buckley, P. J., Yu, P., Liu, Q., Munjal, S., & Tao, P. 2016. The institutional influence on the location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2(3): 425–448.

Campbell, J. L. 2007. Why would corporations behave in socially responsible ways?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3): 946–967.

Campbell, J. T., Eden, L., & Miller, S. R. 2012. Multinational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host countries: Does distance mat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3(1): 84–106.

Colen, L., Persyn, D., & Guariso, A. 2016.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FDI: Does the sector

matter? ***World Development***, 83: 193–206.

Cormier, D., Magnan, M., & Van Velthoven, B. 2005.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quality in large German companies: economic incentives, public pressures or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14(1): 3–39.

Cuervo-Cazurra, A., & Ramamurti, R. 2014. ***Understanding multinationals from emerging marke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i, L., & Jiang, F. 2012. State ownership effect on firms' FDI ownership decisions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invest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3(3): 264–284.

Demuijnck, G., & Fasterling, B. 2016. The 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6(4): 675–685.

Den Hond, F., Rehbein, K. A., de Bakker, F. G, & Lankveld, H. K. V. 2014. Playing on two chessboards: Reputation effects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CPA).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1(5): 790–813.

Dorobantu, S., Henisz, W. J., & Nartey, L. J. 2017.

Not all sparks light a fire: Stakeholder and shareholder reactions to critical events in contested marke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2(3): 561–597.

Dowling, J., & Pfeffer, J. 1975.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Social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8(1): 122–136.

Du, S., & Vieira, E. T. 2012. Striving for legitimacy throug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sights from oil compani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0(4): 413–427.

Franks, D. M., Davis, R., Bebbington, A. J., Ali, S. H., Kemp, D., & Scurrah, M. (2014). Conflict translate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 into business cos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21): 7576–7581.

García-Canal, E., & Guillén, M. F. 2008. Risk and the strategy of foreign location choice in regulated industr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9(10): 1097–1115.

Gong, X. 2018. China Power Investment Corporation in Myanmar. In A. Arduino & X. Gong (Eds.),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121–146.

Palgrave, Singapore.

Gonzalez-Vicente, R. 2012. Mapping Chinese mining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s or market? ***The China Quarterly***, 209: 35–58.

Henisz, W. J., Dorobantu, S., & Nartey, L. J. 2014. Spinning gold: The financial returns to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12): 1727–1748.

Hilson, G. 2012.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Experienc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ources Policy***, 37(2): 131–137.

Ho, S. S. H., Oh, C. H., & Shapiro, D. 2023. Ca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ad to Social License? A Sentiment and Emo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forthcoming.

Hoetker, G. 2007. The use of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4): 331–343.

Hofman, P. S., Li, L., Sun, S. L., & Sun, Y. 2019. Institutional drivers of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nd legitimacy of Chinese MNEs. In L. C. Leonidou, C. S. Katsikeas, S. Samiee, & C. N. Leonidou (Ed.), ***Socially 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98–132.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Kerner, A. 2009. Why should I believe you?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3(1): 73–102.

Klein, J. G., Smith, N. C., & John, A. 2004. Why we boycott: Consumer motivations for boycot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68(3), 92–109.

Kobrin, S. J. 1979. Political risk: a review and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0(1): 67–80.

Kostova, T., & Zaheer, S. 1999.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under conditions of complexity: The cas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1), 64–81.

Lewin, A. Y., & Witt. M. A. 2022.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overlooked centralit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5(2): 266–275.

Li, J., Liu, B., & Qian, G. 2019.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friction and ethnicity: Their effects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SMEs i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4(4): 50–359.

Li, J., Van Assche, A., Li, L., & Qian, G. 2022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3: 902–919.

Li, J., Meyer, K.E., Zhang, H., & Ding, Y. 2018. Diplomatic and corporate networks: Bridges to foreign loc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6): 1–25.

Li, J., Newenham-Kahindi, A., Shapiro, D. M, & Chen, V. Z. 2013. The two-tier bargaining model revisited: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investments in Africa.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3(4): 300–321.

Li, J., Shapiro, D., Peng, M. W., & Ufimtseva, A. 2022b. Corporat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US–China Rival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6(4): 1007–1032.

Li, J., Xia, J., & Lin, Z. 2017.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by state-owned firms: How do legitimacy concerns affect the completion and duration of their acquisi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9): 1915–1934.

Liu, W., & Dunford, M. 2016.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Unpack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1(3): 323–340.

Lu, J., Liu, X., Wright, M., & Filatotchev, I. 2014.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FDI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home country government support and host country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4): 428–449.

Luo, X.R., Wang, D., & Zhang, J. 2017. Whose call to answer: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firms' CSR report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0(1): 321–344.Luo, Y. 2006. Political behavi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erceived corruption: A structur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7: 747–766.

Marano, V., & Kostova, T. 2016. Unpacking the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 adoption of CSR practice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3(1): 28–54.

Marano, V., Tashman, P., & Kostova, T. 2017. Escaping the iron cage: Liabilities of origin and CSR reporting of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3): 386–408.

Mellahi, K., Frynas, J. G., Sun, P., & Siegel, D. 2016. A review of the nonmarket strategy literature: Toward a multi-theoretic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42: 143–173.

Meyer, B. D. 1995. Natural and quasi-experiment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3(2): 151–161.

Meyer, K. E., Ding, Y., Li, J., & Zhang, H. 2014. Overcoming distrust: How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dapt their foreign entries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bro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 1005–1028.

Nartey, L. J., Henisz, W. J., & Dorobantu, S. 2018. Status climbing vs. bridging: Multinational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rategies. ***Strategy Science***, 3(2): 367–392.

Neumayer, E., & Spess, L. 2005.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3(10): 1567–1585.

Oh, C. H., & Oetzel, J. 2017. Once bitten twice shy? Experience managing violent conflict risk and MNC subsidiary-level investment and expans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3): 714–731.

Oh, C. H., Shapiro, D., Ho, S. S. H., & Shin, J. 2020. Location matters: Valuing firm-specific nonmarket risk in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1(7), 1210–

1244.

Prno, J., & Slocombe, D. S. 2012.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in the mining sector: Perspectives from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theories. ***Resources Policy***, 37(3): 346–357.

Rodriguez, P., Siegel, D. S., Hillman, A., & Eden, L. 2006. Three lenses o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olitics, corrup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7(6): 733–746.

Röell, C., Osabutey, E., Rodgers, P., Arndt, F., Khan, Z., & Tarba. S. 2022. Managing socio-political risk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Lessons from MNE subsidiaries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7(3): 101312.

Ryan, T. P. 1997. ***Modern regression methods***. New York, NY: John Wiley and Sons.

Scherer, A. G., & Palazzo, G. 2007. Toward a conception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and society seen from a Habermasian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4): 1096–1120.

Scherer, A. G., & Palazzo, G. 2011. The new political role of business in a globalized world: A review

of a new perspective on CS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irm,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8(4): 899–931.

Scherer, A. G., Rasche, A., Palazzo, G., & Spicer, A. 2016. Managing for politic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New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PCSR 2.0.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3(3): 273–298.

Shapiro, D., Hobdari, B., & Oh, C. H. 2018a. Natural resourc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3(1): 1–14.

Shapiro, D. M., Vecino, C., & Li, J. 2018b. Exploring China's state-led FDI model: Evidence from the extractive sectors in Latin Americ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1): 11–37.

Simon, J. D. 1984.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ris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5(3): 123–143.

Stevens, C. E., Xie, E., & Peng, M. W. 2016. Toward a legitimacy-based view of political risk: The case of Google and Yahoo in Chin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5): 945–963.

Sun, P., Doh, J. P., Rajwani, T., & Siegel, D. 2021.

Navigating cross-border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multinational nonmarket strategy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2: 1818–1853.

Sun, P., Mellahi, K., & Wright, M. 2012.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corporate political t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6(3): 68–82.

van Hoorn, A., & Maseland, R. 2016. How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effects vs institutional profile eff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7(3): 374–381.

Wapmuk, S. 2012.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between Nigeria and India. ***Africa Review***, 4(2): 122–135.

Witt, M. A. 2019. China's challenge: geopolitics, de-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5(4): 687–704.

Young, S., & Marais, M. 2012.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of CSR repor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y risk characteristic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 (5): 432–450.

Zhang, W., Alon, I., & Lattemann, C. 2018.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nging the Rules of Globalizatio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